

美苏学者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两者的关系

刘 绪 贻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半个世纪以来名满国内外,他的著作被译成10余种语言,销售量达数百万份。苏联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现为《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编辑,对苏联经济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具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其著作亦深受欢迎。他们两人都曾从政,也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他们相识近1/4个世纪。为加深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了解,为把两者之间“辛酸痛苦的过去”变为“较美好的未来”,他们在1987年有计划地进行了约10天的交谈,并于1988年将交谈成果用英、俄文分别在美、苏同时发表,书名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共存》。由于知识渊博,头脑较清醒,对世界和人类前途非常关注,他们两人都较能不囿于成见和各自社会制度的狭隘利益,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两者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以此为参考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将他们的主要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一、对社会主义看法

缅希科夫认为,“在过去70年中,社会主义已证明自己是一种发展的、有生命力的制度。”虽然在许多情形下,社会主义未能按照最理想的道路前进,从而未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如公平正义、没有经济危机、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但苏联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而且,自1917年以来,社会主义在许多、而不仅是一个国家得到发展”,“牵涉到的人数很多,世界上约1/3的人口目前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象包括世界2/3人口的资本主义一样的国际体系”。“对相当一些国家来说,社会主义是它们取得主权独立的途径”,“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巨大的经济进步”。

但是,自从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与社会主义已逐渐陷入一种“前危机形势。”缅希科夫说:“70年代开始时,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以每年约5%或6%增长率增长,但到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初,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降到最多1%至3%之间。……而且重要的是,这是一种长期减速……现时……我们仍未扭转这种形势。”“同时,这种减缓也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严重问题。”

造成这种减速的原因,缅希科夫认为,固然70年代中期能源价格陡涨、西方国家市场滞

销使苏联向西方国家出口非常困难，都有影响，但主要原因来自社会主义本身。

从劳动力使用情况看，以往苏联92%的全部成年男女强劳力从事劳动，而且他们的就业是适得其所。现在，苏联一方面出现劳力供应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劳力的使用又十分不当，劳动效率很低。许多工厂积累着拿工资的过剩工人；它们把他们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在一个计划期快结束需要突击增产的时候。因此，一个月、一季度或一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没有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

从资本增值情况看，在50和60年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基本投资的部分达35%（日本为40%），这使苏联“能够在全国建设大量的工业企业。”但是，由于国营工厂不注意节约人力与成本，往往超计划地雇佣工人和付工资，用以提高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上级规定的生产计划，从50年代初起，人们的实际收入提高了；而且由于人们实际收入增长迅速，国民生产总值中能够用于基本投资的部分便迅速下降。其次，赫鲁晓夫的住宅建设计划，也减少了用于基本投资的资金。又其次，苏联的农业到70年代晚期停止发展，使苏联不得不从输出石油得到的硬通货去购买谷物，而不能用这些硬通货去进口更多的工业现代化必需的机器。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苏联生产不足，社会主义经济变成一种匮乏经济，人们有钱买不到需要的产品，到处出现排长队的现象。不仅如此，在生产受消费者欢迎的新产品方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落后的，即使它们有这样的生产潜力；“在创造新工艺方面，它们也落后，尽管它们的经济迫切需要这种新工艺。”因此，社会主义没有带来列宁认为会带来的世界上最高生产水平。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40多年中，“有的国家彻底改变了，日本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生活水准非常接近于美国。与此同时，我们苏联却落后了。”此外，“商品不足的状况和定量分配……的制度，有助于贪污、黑市和地下经济的产生，而且无法消除。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已成为苏维埃经济的基本特征。60年代以来，尤其如此。”这是因为，“随着官僚体制的发展，商品匮乏的状况更加严峻，供给不足的状况蔓延至所有经济部门。这就导致地下经济大肆活动。”除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棉产部的虚构棉花外^①，“还有其他许多例子，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的各地零售贸易，多年以来已成为一种异常邪恶的骗局。它们故意造成商品短缺，……一般消费者买不到的产品都以极高价格出售，而地方当局的员工则定时接到真正第一流消费品的贿赂。”

所有这些，都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形象。

锡希科夫认为，“如果社会主义真正想成为世界上其他人民的榜样，它就必须是生产能力最强、最有效率、最人道、最民主的制度。它必须能为其全体人民创造最高生活水平。”显然，目前社会主义并未达到这种境界。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不能成为世界人民的榜样。

勃列日涅夫时代（1964—1984）结束以来，苏联人民对这种“前危机形势”的社会主义现状的讨论，涉及到了苏联社会制度的基础，使人们对苏联“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提出了疑问。”

“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经济发展减速和停滞的主要责任者，是现存的计划和管理经济的制度。这种制度过于中央集权化，中央机构实际上试图与经济生活的每个细节发生关系并进行干预，致使企业即使有刺激也非常弱小，解决自己问题的可能性即使有也微不足道。”“从最高领导一直到实际生产部门，都由那些自己不参加生产或不理解所从事的工作的人发布官僚主义的命令。这已成为普遍的作风……特别有害于农业。”而且，这些“官僚机构虽然发布命令，但都不对命令的后果负责。”官僚们“有权无责”，可以胡作非为。

不仅政府的多数部是这样，“科学的领导部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院——也是这样。……在许多情形下，领导人来自那些对任何科学领域都不精通的人，而他们是天生不能在科学或技术领域带领人们前进的。”

缅希科夫认为，这种中央集权经济可以迅速地发展工业基础，但“事实已证明，一个过于中央集权的社会不可能”“继续有效地使之〔指这种工业基础〕发挥作用。”从50年代晚期起，苏联人已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从赫鲁晓夫时期起，一再作过改革的尝试，但为什么改变得如此缓慢呢？“原因是：这种集权已造成一个社会官僚阶层。一个对维护官僚政治具有既得利益的官僚政体……只要有过于中央集权的制度，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集中管理经济的重要社会阶层。现在，苏联这个阶层由从事商品规划及分配的经济部、局中不断增加的高中级政府雇员组成”，“其中有些人收入相当可观，另一些人收入较少，但重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非常稳固，而且，除报酬外，他们还有社会声誉。”“在匮乏经济中，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谋取权力。”

“戈尔巴乔夫说，现在，我国2.8亿人口中有1800万人——占总劳力的15%——属于那个官僚阶层。他们之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官僚，但他们都在管理部门及行政部门的各种不同岗位上工作。”

这些官僚们“满足于旧体制，而且不愿意适应新情况。对他们很大一批人来说，调整适应确实可能非常痛苦。有些人可能（而且已经）被转到生产性企业，而他们却感到失去原有职务赋予他们的威望和权力。”这就是说，官僚们对旧官僚体制具有既得利益，他们是改革的巨大阻力。

反之，官僚体制寻求自我生存的理由和新形式的能力是很强的。匈牙利是中断了中央计划若干年的国家，但该国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指出：“在匈牙利，直接官僚控制的旧命令体制”，已转变为一种“间接官僚控制的体制”。“有些人说，南斯拉夫在取消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方面是成功的，但现在有许多人谈到那里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官僚政治干预生产企业的事务。”

由此可见，铲除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僚体制，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就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并非易事。

缅希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或革命）就是为了挽救上述社会主义的“前危机形势”而出现的。它的“主要目标，是解除经济的官僚政治负担和束缚，是铲除地下经济和各种不同形式的贪污腐化和黑市。……它们将大门向个人和集体首创精神敞开着，并将之和集中计划的有利条件结合起来。”

这种改革有三种可能前景（但实际可能前景是这几种前景的结合体）：第一种是由于官僚政治的反抗而维持现状（现在，苏联的官僚机制和地下经济界已在互相勾结，力图破坏改革）。这样，就“将是经济继续停滞，通货膨胀，象波兰那样的大量外债，以及我们不愿其永久存在的其他特征。”第二种前景是一种走向更完整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它主要意味着完全由市场决定价格，而且将引进自由劳动市场。在决定工资方面将有较多灵活性，而且在这种体制内部将有一种灵活的资本与信用市场。总之，这是一种完全没有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这种经济容易出现失控的通货膨胀，就象在南斯拉夫，工人主管企业，使工资增长超过生产力的提高。“第三种前景可称为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它把中央计划中最好的东西和市场机制中最好而害处最少的东西结合起来，很好地利用两者。”

此外，缅希科夫还谈到民主和经济改革的关系。他说，“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改革失

败原因之一，是那些改革没有和扩大民主结合起来。民主和经济改革是必须互为补充的。”目前，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公开性和民主被看成非常重要的工具，用以控制官僚政治，并防止官僚机构追求也许不是集体或国家利益的利益。”公开性已成为“经济改革的工具。”

二、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加尔布雷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使人类的生产力得到巨大的促进。“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也产生一种大规模的工业工人和某些其他集团人民的异化。”“这是资本主义固定在所有者和资本家手中的巨大权力和工人只有极少权力造成的。而且，也是由于资本主义迫使少数不幸的集团遭受非常的苦难”，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困境。

“不过，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不久就出现四种新情况……其一是工会的成长，它大大促进了雇主和雇工之间权力的平等。其二是福利国家的发展。”第三种情况出现于30年代，与凯恩斯著作有关，这就是由国家对于经济的生产水平负责任，其基本构想是：政府预算将补偿私人开支任何不足。第四是“旧式资本家的最后消灭，并由经理即公司官僚代替。”如果没有这四种发展，资本主义不会存在下来。有了这“四种发展，在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中，资本主义已大体上被人们接受”，就连工会和工人阶级，也接受了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从1945至1970年，我们有过25年的好时光。”但是，好景不长。“有几种事态发展损害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其中有些和我们谈过的损害社会主义运行的事态一样。〔首先〕，大公司和管理革命已使大部分资本主义生产官僚主义化。”其次，“不仅日本，还有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日益增长的力量。它们的工业已侵入美国和其他较老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而且对旧的大规模工业（钢铁、汽车等）具有特别不利的影响。”第三（也是主要的）是凯恩斯体制中出现内部矛盾，“当需要政府支持经济时，解决办法非常容易——减税、增加开支。这是些政治上非常受欢迎的办法。但……在70年代，通货膨胀成了问题。显然，这要求政府减少开支、提高税率，也提高利率。所有这些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这就是我将描述为凯恩斯体制的政治上不对称现象。”

至于通货膨胀主要原因，加尔布雷思认为，主要是大公司提高物价能力和大工会提高工资能力导致的工资—物价动力造成的。

由于以上凯恩斯体制的政治上不对称现象和物价—工资动力，美、英政府认识到凯恩斯主义无能为力，于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采取了一种魔术式的、无痛苦公式来解决问题，在美国为货币主义（加尔布雷思认为人们根本就不认真看待供应学派）。这种政策导致毁灭性赤字，进一步削弱美国的钢铁、汽车及其他工业，造成大量失业（西欧10%），还有助于引起一种反福利国家运动，对下层阶级不利。加尔布雷思认为这种政策的寿命是长不了的、只是过渡性的。不过，虽然有这些问题，加尔布雷思认为现在的走福利国家道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发生30年代那样的、使资本主义濒于崩溃的严重危机。

加尔布雷思认为他有一套较好的解决当前资本主义问题的方法。他认为，“现时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不是物资或服务的增产，这些是可以实现的。中心问题是保证所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参与者有可靠的丰富收入。”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大城市内有太多的人没有就业、没有收入；二是在收入分配方面，不平等太严重。因此，他“将主要强调加强……社会与福利计划，以便没有就业的人有可靠的收入……也将为解职的工人制订过硬的重新培训计划，还要为良好的中、小学教育花更多的钱。”他“将继续强调改进除富人以外所有人都需要的公共服

务的重要性”，即中小学教育、娱乐、图书馆、清洁街道、街道安全、医疗照顾、公共交通、公共住宅、更好的环境保护。

从宏观方面说，他认为必须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更少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最简单地讲……现在应当动手增税，减少现时联邦政府赤字，大大降低实际利率。”

由于增税在政治上不容易做到，最好是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这就要求苏联合作。

加尔布雷思承认美国有个下层阶级，但认为上半世纪中美国大大缩小了它。他认为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必需的改革运动之一，所以要加强社会福利事业，不能缩小这方面开支。

关于资本主义前途，缅希科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确在开始一次新技术革命，而这次革命可能引起经济全面上升，以取代目前停滞或低速增长时期。不过，这种可能性面前有两个障碍。”一种是军备竞赛的继续，另一种是近来部分关闭了的第三世界市场。关于停止军备竞赛问题，两人都认为不容易，但现在戈尔巴乔夫已采取主动行动，美国也有所响应；而且美国人民日益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因此也是有可能的。至于近来部分关闭了的第三世界市场，只要第三世界解除了大量外债的束缚，是可以重开的；而加尔布雷思认为，第三世界的大量外债是不可能得到偿还的，愈早取消愈好。由此可见，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通过目前的新技术革命而引起经济全面上升不是不可能的。

三、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看法

1. 到了必须重新估价的时候

缅希科夫与加尔布雷思都认为，目前已到了一个人类文明史的转折点，必须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价。首先，由于有了核武器，美、苏两个代表两种不同而且互相竞争的社会制度的主要强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可能引起人类文明以至两种制度的终结。因此，在核战争面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意义不大。其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国际体系，多年以来已逐渐成为定局，社会主义要推翻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消灭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这个星球可以有两种经济制度并存。再次，目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处于一种危机或前危机形势，造成这种形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的美、苏关系（比如军备竞赛）或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因此，摆脱这种形势有赖于改善这种传统关系。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人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和苏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存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2. 共存的条件

缅希科夫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提出了三项共存的主要条件，并得到加尔布雷思的同意。这三项主要条件如下：第一，美、苏两国走各自的道路，不要试图妨碍对方，相互之间不要采取任何蓄意的行动给对方制造困难。与其谋求短期利益，不如强调长期利益，因为双方利益互相联系，所以要考虑对方利益。第二，要认识到美、苏仍然有可能陷入直接或间接对抗，重要的是，当出现这种形势时，双方的行动要与过去的极其不同，双方必须停下来想一想，决不要立即全力以赴地作出反应。应该互相协商，并寻求一种建设性的、和平的解决办法。第三，尽管两种制度有对抗，也许存在冲突，但双方可以而且必须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合作的技巧可以不断发展，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会把对方看成在向一个更美好的

（下转73页）

五十年，中国是有希望过农业关的。

注释：

① “五·七”指示是1966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军委总后的报告上的批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2)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我们离开中国国情对此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我们错把农民织土布、养母猪、种苕芭视为资本主义加以禁止。

实际上在中国商品经济十分贫瘠的土地上，资本主义的滋生是异常艰难、缓慢、脆弱的。

.....
(上接111页)

世界前进中的伙伴，而不是竞争者或敌人。

此外，他们两人还共同提出一些促进两种制度共存与合作的意见。两人都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有利于社会主义，反之亦然。而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世界的经济情况良好，则有利于改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两人都要求停止军备竞赛(包括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而且认为将来这是可能的；认为应取消一切贸易限制，尤其不能利用贸易或贸易限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双方都应该退出其他国家的冲突，并尽力劝阻这种冲突；双方都不应宣传对方制度运转不灵或失败，不应把自己制度说成是“道德的中心”而对方制度是“罪恶的中心”，总之应停止敌对宣传，反之，双方都应鼓励与对方和解的政治意志。

3. 世界的前途

加尔布雷思：我猜想我们将有一个混合的社会。现时的社会主义世界将有一种沿着我们讨论过的路线走向市场的运动，资本主义世界将致力于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更大关注。从现在起再过100年，仍将有一些国家进入这种更加成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体的行列。

缅希科夫：一般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未来社会将是一种现有社会形态的混合体，也许有某些新社会形态出现。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一致认为，在现代核世界里，我们两种制度除按照我们现在走的道路走下去以外，别无选择。而且，在循着这条道路走时，还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走向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

加尔布雷思：我同意这种看法。而且，我对超级大国力量收缩感到满意。如果超级大国继续扩张，最后冲突就不可避免。我也对苏联重新检查而且修改它的制度的方式感到满意。最后，我非常希望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们美国人将继续追求一种和谐的更为正义的社会。

注释：

① 该部多年来超报棉产量，每年高达100万或100多万吨。通过虚构帐目和贿赂各加盟共和国纺织厂经理们，这批不存在的棉花被售予各该厂，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获得巨额非法收入。